

『六十岁学吹打』

谈瀛洲

鸥牌120相机，仿禄莱那种双反相机。我爹有时候会给我们拍照。他对摄影挺有兴趣，但拍得不多。当时我就觉得用这相机拍照挺麻烦，曝光只能靠自己毛估估，比如晴天，光圈该用多少；阴天，光圈又该用多少等等。（测光表什么的不是当时普通摄影者拥有的设备。）而且拍成什么样也不能马上知道，要等胶片冲洗出来的时候才能知道。

后来1987年的时候从美国做交换生回来，就用课余时间打工的钱买了一台有自动测光系统的理光胶片相机，价格要2000多元人民币。当时大学生刚毕业一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元，所以这台相机绝对是个奢侈品。家里的相册中，迄今还有我为同学们在四年级毕业时拍的许多留念彩照，曝光既没有过也没有不及，而是正好，都是我在这台有自动测光系统的理光相机拍的照。

但我用这台昂贵的相机拍的照片却不多。为什么呢？胶片太贵。青年时代的我，没有太多的余钱花在购买胶片上。

等到年近四十，有点余钱的时候，又买过一个尼康胶片相机。那时候的相机，一般都有自动测光系统了。那时我去云南、西藏旅游，拿它拍过不少风光照。当然和专业摄影师相比，是拍得很少了，但家里那个放照片和胶片的柜子已经塞得满满的，而且溢出来了。所以，最终用那台尼康胶片相机拍的照，也不是很多。

像用胶片拍而且拍得很多的荒木经惟，就遇上了胶片管理的问题。有的胶片找不到了，有的胶片因为收藏不善而老化、腐坏了。当然，他是个什么都能利用的人，就用腐坏的胶片印出了一批照片，也成了艺术品。

数码摄影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福音。有些传统主义者，坚持说胶片摄影有种种数码摄影所不能及的优点，但又语焉不详。我觉得他们只是怀旧，和对一种老的、自己已经习惯了的摄影技术有所依恋而已，并没有什么道理在内。而且用胶片拍了照，最终底片还要拿去用昂贵的高级扫描仪扫描成数码图片，我觉得这显然是多此一举。

买了数码相机开始给植物拍照，是从2005年开始。先是用半画幅的后来又是全画幅的尼康，镜头也买了好几种，最终确定只有105毫米和60毫米焦距的微距镜头，才是最适合我拍植物的镜头。用手机也拍得很多，从HTC用到华为。但也要过好几年，才找到自己的风格与相配合的一些技巧。

从2012年开始，觉得自己拍的照片中有些可以选出来看看的了。这次“花影”展所选的最早一张照片，是2015年拍的一张红花石蒜（也叫彼岸花、曼珠沙华）。之后的每一年也不过选两三张照片。2016年的一张也没选。其实可以选更多照片，但因为展览空间所限，多了也放不下。2020年底和2021年初，因为知道会有这个展，起劲地拍了许多照片，从中也选出一些。

数码摄影的一大好处，是拍好一张马上就可以在液晶屏上看效果，不满意马上就可以调整，在这过程中慢慢摸索、提高，对学习摄影技巧、提高摄影水平特别有帮助。不像胶片摄影要经过漫长的冲印过程，等照片印出来后才发现拍得不好，拍摄对象早已不在了，也无法改进了。

数码摄影的第二大好处就是降低成本，减少浪费，也方便分类与储存照片。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才来办摄影展也是有原因的。对摄影的兴趣，其实贯穿我的各年龄段，但之前总是缺少点契机让它成长、壮大。到了现在这个时代，适合我的摄影技术成熟了，并且能以我支付得起的价格买到了。它也和我的生活和生命融合到一定程度了，终于可以爆发和开花了。

“花影”摄影展：上海安福路233号101室，6月6日-7月6日（周一休息）

小时候，常常听外婆（祖母）用带苏州口音的上海话，说一些江浙地区的俗语，如“六十岁学吹打”。这话的意思，按我的理解，是笑人做事起步太晚的意思。我现在到了五十五岁，才来安福路的老房子办我的第一个摄影展“花影”，也有些“六十岁学吹打”的意思了，虽然离六十岁还差着五年。

“到了这个年龄，再来办摄影展，到底有没有意思呢？”说实话，刚开始和策展人孙净讨论摄影展的想法的时候，这个疑问曾多次出现在我的内心之中。我甚至还和两个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记得他们当时还是相当鼓励我的。现在展览也办起来了，那么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是“有意思”。单从它让我拍了更多的照也拍得更认真，和写了更多文章这两点来说，办这个展就有意思。任何能够让我们更多地“生活”的事，都值得做。我所说的“生活”，指的是不是重复去做那些自己已经习惯去做的一成不变的事，而是指去尝试新鲜的事、获得前所未有的体验，和对自己提出新的挑战。

二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我觉得这是一种矫情的说法。年龄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是实实在在地反映在你的体力、脑力、阅历、学习能力和审美水平上的。我曾经是一个精力很好的人，35岁之前成天看书写作没有问题。但现在就不行了。阅读速度也明显减慢，但我发现理解能力明显提高了。以前年轻的时候看不懂的东西，现在能够看懂了。以前看不出门道的东西，现在能看出些门道了。我的职业是教授英语和英语文学。因为不断在学习和教授英语，我发现即便到了五十多岁，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还在不断提高。由此悟到一样事情只要不断在做，就必然会不断有所提高。

摄影也是如此。在我这个年龄对学习新的东西常常会有抵触感，尤其是学习和数码与机械有关的东西，我毕竟是个文科生——所以学习摄影对我来说特别有挑战。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在学习摄影时更有悟性了。

多年来看画展、摄影展，出国时每到一地都看各种博物馆的习惯，培养了我的审美眼光。学习摄影和学习文学一样，有它的经典书目，那就是大师们的摄影集。这些摄影集为数很多，有些可以买来仔细研究，有些可以在B站上看看——B站上有许多关于摄影的视频，有些就是把大师摄影用视频的形式一张张呈现出来，效果跟翻书差不多。还有一些理论书籍，比如罗兰·巴特的《苏珊·桑塔格的》，也陆续找来看了。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真的去拍，去实践。不然，你大师摄影看得再多，也不会拍照。就像你大师作品读得再多，如果不去写作，也永远成不了作家一样。

三

说起摄影，其实我很早就有兴趣。前段整理藏书，还找出几本《摄影基础知识》之类的书籍，都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收藏着的。当时家里有一台海

最初知道李季的名字，是在语文教科书上，里面有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节选，读起来朗朗上口，引人入胜。文学界的泰山北斗对这部长诗推崇备至，评价很高。茅盾说：“这是一个卓越的创造，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也不过分。”孙犁说：“这是完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是“开一代诗风”的“不朽之作”；还说，这“绝不是单凭采风所能形成的，它包括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李季幼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是真正与当地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是认真地研究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他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毋庸置疑，李季是新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人物，是中国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者，是一位有独特艺术个性的淳朴的诗人。

记得我刚调到中国作协不久，就听到不少关于李季的故事。说他尊重关心爱护老作家，不管大事小情，事必躬亲，全心全意为老作家服务，老作家有事也都愿意找他。曹禹到新疆体验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风情，为创作话剧《王昭君》做准备，就是他一手组织安排的。1978年秋天，他亲自去天津，请孙犁来北京开会。孙犁本来不愿打乱自己的生活规律，按照会议日程活动，但有感于他的热情，不仅来了，而且坚持了一个星期，直到把会开完。1980年春天，中国作协组建访日代表团，原拟请一位老作家率团出访，但日方说，日本首相平正芳是读书家，年轻时读过巴金的书，如果巴金来，他愿出面会见。李季为此先后两次专程去上海，劝说巴老。开始时，巴老没有答应，一是觉得代替那位老作家当团长不合适；二是有许多东西要写，抽不出时间。但李季说，作协工作现在刚刚恢复，您日本朋友多，再加上日本首相会见，影响大，对今后发展中日友好、扩大文化

交流有利。巴老一再犹豫，最后勉强同意。事实证明，巴老率团出访，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

他关心青年作者的成长，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写作创造条件。1965年，他在来稿中发现天津海洋渔业公司一位叫王家斌的年轻海员，写海洋生活很有特色，就把他请到编辑部，推荐他读《冰岛渔夫》《蟹工船》《白鲸》《海底两万里》等书，并指派编辑帮助他改稿。王家斌的小说《聚鲸洋》改完第六稿后，李季出面请刘白羽、张光年、张天翼等大作家帮助修改润色，最后上了《人民文学》的头条。他提醒作者，出名后要戒骄戒躁，“要经受住名利的考验”。若干年后，王家斌给李季写信说，为了开阔视野，扩展写作题材，想到远洋轮去体验生活。李季很高兴，要求作协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并亲自与他谈话，叫他多读书，努力学习海洋知识，做好海员工作，写好海洋生活……

他在干校当管理后勤的副连长时，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为了搞好一二百人（包括家属小孩）的伙食，他组织种蔬菜、油菜、芝麻，养猪、养鸡、养鸭，使连队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肉蛋蔬菜自给有余，还上交国家几千斤油料……

在沙滩北街2号中国作协的小院里，常常看到他来去匆匆的身影，听到他河南味浓烈的说话声，还有那坦率真诚、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他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主持作协的日常工作。在文学界，他可能是最忙的人。不断地开会，讲话，批阅文件，创办刊物，组织评奖，布置工作，与人谈话，写文章，桌子上的文件堆积如山。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像一个飞快旋转的陀螺，一刻也不停息，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患有严重心脏病、靠“消心痛”支撑的老病号。

他没有官员的威严，也无名人的矜持，朴实得像个生产队长，或街道办事处主任，对作家如此，对我们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也如此。你看他与你讲话时，目光是平视的，没有居高临下的高傲。与你握手时，他是真诚的，不是应付敷衍，更不是做作的亲民表演。他热情爽朗，精力充沛，像一团火。你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就能明显地感觉到，出作品，出人才，繁荣文学，团结作家，为作家服务，是他心中的重点、兴奋点、头等大事，也是中国作协机关工作的主旋律。

那时作协领导没有秘书，有事请示报告，推门就进。有一次，我去给李季送外事简报，一位领导叫我顺便带一份文件交给他，他看了看说：“你跟他讲，这件事，反映不太好，以后不要搞了。”他是个痛快人，敢于负责，不管是多么复杂的问题，棘手的事情，赞成或反对，都态度分明，从不模棱两可，拖泥带水。

我第一次给他当翻译，是去机场迎接日本外宾。那天一上车，他就说：“你叫陈喜儒，学日语的，喜欢文学。”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没跟他说过话，他怎么知道我？他说：“我看过你的材料。”原来，我到作协来，是他审批的。那时，作协刚刚恢复，事务繁杂，调进调出的人很多，他每天不知要批多少公文，能记住我这无名小卒的名字和简历，说明他记忆力惊人。他问我读过哪些日本文学作品，喜欢哪些作家。到作协工作是否适应，有什么困难。我说的单位的外事部门，有详细明确的分工，翻译只管翻译，但我们这里不行，还要买机票，订宴会，找饭店，迎来送往，吃喝拉撒睡，一勺烩，全都得管，有点“全方位包产到户”的意思，一时还不太习惯。他笑着说：咱们的机构还不健全，以后会逐步改善。

会谈时，日方邀请中国作家代表

团访日，并希望李季亲自带队，说很多日本朋友想念他。他说：“1961年，我曾随巴金先生访问过日本，但还有很多作家没去过，也想去看看，还是叫他们先去吧，我以后有机会再说。”但日方认为，他那次访问是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虽然走了不少地方，结交了很多朋友，但主要是开会，如今日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去见老朋友，了解一下新情况，商讨一下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文学交流，是很有必要的。李季笑着说：“我感谢各位的美意，但这次我就不去了。我也很想念日本朋友，请代我向你们问好。中国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欢迎他们有机会来中国看看。”

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出国访问，对个人对家庭都是件大事。第一，能出国，说明此人政治可靠，组织信任，工作积极。第二，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才干。第三，不但发给制装费、零用钱，还有买一件外国原装的电器如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的指标。谁家有人出国，那是令人羡慕的，所以有人费尽心机，投机钻营，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但李季对日方的邀请，一再婉拒，可见他心里想的是工作，不是那些个人小利。

后来我在他的诗集中看到他当年访日时写的短诗《“和歌”三篇》，和根据日本民间故事写的长篇叙事诗《海誓》《借刀》，他满怀热情地歌颂友谊、爱情和英雄。尤其是他模仿日本传统诗歌——和歌（5行31个音节，按5、7、5、7、7排列）的格式，用31个汉字写的短诗（姑且斗胆称之为“汉歌”吧），对于汲取外国文学的营养，丰富中国的诗歌形式，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比如他那首《飞机中流富士山》，就是中国诗人采取和歌的形式，用中文描绘日本山川风月的尝试，读起来格外有风韵情趣：

远望富士山，
巍峨峙立沧海间。
海浪无边远，
山影遮海船如丸，
富士白发扫云天。
遗憾的是，模仿日本俳句的“汉俳”后来在中国蓬勃兴起，而模仿和歌的“汉歌”却悄无声息，这是后话。

1980年3月9日，星期日，下午，我到作协机关去值班。走进值班室时，看见总务处老周正与一个人说着什么。他见我进来，转头对我说：“小陈，你知道吗？李季同志逝世了！”

“什么？你说什么？哪个李季？”
“就是副主席李季呀！”

“不会吧？昨天上午我还看到他，挺精神的！”

“谁不说呢！可是昨天下午四点多钟，突发心脏病，走了。”老周言之凿凿，感叹唏嘘，但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是事实！

前一天上午，李季来作协机关开会，要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在会议中间，他出来给《人民文学》编辑组打电话，说他下午两点去医院看望丁玲，然后顺道到前门招待所去看外地来京改稿的几位作者，准备同他们谈谈修改意见。那天风大，阴冷，不时下一阵小雨。他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高高兴兴的，又说又笑。有位女同志对他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他说：对，对，我是来向你们表示祝贺的。他挨个办公室走了走，祝女同志们节日快乐。

十一点钟，他去招待所看望一位多年遭受磨难刚刚平反的老同志，拉老同志回家吃饭。他平素喜欢喝点啤酒，但家里啤酒喝光了，他就叫阿姨去买，不巧没有买到。那时物资匮乏，日常生活用品，有的还凭票供应，不是想买就能买到。李季一定要喝口酒表示祝贺，于是就东翻西找，把一瓶不知治什么病的药酒翻了出来，两人各斟一杯。那位老同志喝了一口，觉得不是味，说这酒喝下去嘴有点发麻，我不会喝，剩下的你喝吧，就把酒给了李季。李季喝完酒，觉得不太舒服，司机说，送你去医院看看吧。他说不用，我睡一会儿就好了；下午我要去看丁玲，她住院了，要动手术。但他开始呕吐，继而昏迷，经多方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才57岁！

李季生前曾到玉门、大庆、克拉玛依、柴达木、大港、胜利、柯克亚油田，深入生活，与石油人有深厚的感情，写了很多“石油诗”，被誉为“石油诗人”。他爱石油人，石油人也爱他。那天远行，他身着崭新的石油人的工作服，枕边放着一顶银光闪闪的铝盔，静静地睡着，好像稍事休息，马上出发。

1958年，他36岁时，在名为《最高奖赏》的诗中说：

广阔的生活道路，
培育着无限美妙的理想。
那千种万种的工作岗位，
又曾使多少颗心为之激荡。
可是我呀，
却只愿当一名石油工人，
一顶铝盔就是我的最高奖赏。

《奥德赛博》糖匪著 后浪|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版



见春·铁筷子（摄影）谈瀛洲

近读录

外星友人与牛仔大叔

王占黑

有时候真怀疑这些钟情于写科幻小说的人，会不会就像《博物馆之心》里的主角一样，是从外太空跑过来的，带着好奇的眼光打量地球上的一切，又试图通过模仿人类的思考方式和文字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去教训人，启发人，比如，把真相作为某种隐喻记录下来，或者纯粹以恶作剧的方式来混淆人类既有文明的视听。外星人这么高级，多少有点恶趣味吧，所以我更倾向于相信后者。

因此读到《相见欢》里那句“毕竟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地球上”时，我突然就对小小说里的“我”产生了巨大的羡慕之情。哇，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朋友，只要想到他是穿越了某些我穿不过去的结界来找我吃饭的，就觉得帅气极了。我保证，自己一定不会过于缺乏世面地追着他东问西问，而是尽量表现得像一个得体的现代都市人，隔着一张饭桌轻轻描淡写地抒发我对朋友的体恤之情：嗯嗯，你过来蛮远的噢。

往后读几篇，我很快又产生了新

的想法，也可能是想起了《进击的巨人》的那个帕拉迪岛，就开始怀疑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会不会都是外星人的后代？比如一个跑来开垦地却被老家人遗忘的工程队？一个开开心心来度假却错过末班车的家庭？还是一群因为吃错了药毁灭大半宇宙而被惩罚囚禁在蓝色星球上的病人？天晓得。反正和《孢子》一样，我们的记忆不知何时被抹去了。小说里刺师所做的，是让记忆以某种隐秘的形式被记住，哪怕这种形式是暂时的，哪怕被记住的并非记忆本身，而仅仅是一种无用的提醒。就像你听到手机闹钟在大白天突然响了，意识到自己此刻有一件事要去做，但因为没提前写好备注，你死活想不起那件迫在眉睫的事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生活里有一位不肯忘掉历史的有心人，他应该也会想办法去刺师，比如，把秘密藏进大海里，每一次海陆循环，每一滴打到你脸上的雨，都期待着你去揭开谜底。

可我不喜欢下雨，所以我肯定说

不清自己是从哪一辈来的地球。我想糖匪早就知道了一些什么，并且她应该会发现自己原来是来得比较晚的那一拨，因为她的人类属性似乎不是很强。甚至不需要星际飞船或发射器什么的，只需一根巨大的树杈配橡皮筋，随意那么一弹，就来了。她再借这个树杈，把脑子里的小外星人一个个弹进小说里去，这些人有很多不同于我这种普通自信的人类的想法，比如去质博物馆里以实体来证明文明的做法：“经验如何可见，如何被展览？只能去相信它是不同。”在非线性的时间里，一块上亿年的化石不过是多余的痕迹。但他们也有笨拙到感人的一面，比如明明用红外摄像或分子扫描记录就不会被高级生物吞噬，但还是选择了手绘素描，在日复一日的面对面接触中渐渐失去肉身。比如像愚公移山一样坚守着代际传承，只为了实现造汽车回远东故土的梦想。当然还有那些真实的感情。

科幻小说我读得很少，主要是两点，脑子笨，胆子小。小时候在少儿

图书馆看全套《世界未解之谜》，白天津津有味，夜里一关灯，吓得睡不着觉，后来主动拒绝了。这可能也带来一点意外的好处，就是毫无经验让我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设定。怎么说呢，就像UFO划过纽约上空的时候，通勤的纽约客立即感到地球文明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好像很多科幻电影都喜欢把该情节放在这种人类文明高度浓缩的地点，但如果UFO出现在中部大农村的天上，首先，没几个人能看到，就算看到了，不太使用智能手机拍视频的牛仔大叔也只是朝着无人的玉米地嘿嘿一笑：老伙计，让我康康，是谁家的牛皮吹上天啦！

嗯，我大概就是那个牛仔大叔。其实小时候也常常想起宇宙，尤其是去乡下外婆家时，能看到星星的那几天。我一想到星星外面的星星，再想想自己身体里的自己，就慌得要命，人咋这么小，寿命咋这么短。现在长大了，反而一脆弱就努力去想这些，想天外有天，天外还有天，自己连时间放的一个屁都不如，心里就舒坦多了。科幻也好，现实也好，因自己的总是人类自己那些搞七搞八的东西，技术啊，伦理啊，体制啊，历史啊，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这本书的标题里那个常被提到的流行词汇，赛博。一张网。而另一个是不能更隽永的词汇，回家。写作是一场奥德赛，找了那么久，也许就是要冲破那张网，无论尽头是在地球，还是在外太空。